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13
(第12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2)

《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之比较

高 旭[1,2]

(1.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所,安徽 淮南 232001;2.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管子》与《淮南子》都蕴含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而且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强调农业生产的政治性,坚持"农本"理念,是《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二者论农都凸显出天人关系的特殊性,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生态发展;二者都反对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过度干扰和影响,深刻反思人类农业活动的现实的局限性。与《淮南子》相较,《管子》农业观在生态意蕴上缺乏更为浓厚的黄老道家气息,且其农本立场受到"重商"思想的一定影响,但《管子》所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对前者影响深远,成为其农业生态思想得以承继与融会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管子》;《淮南子》; 农业观; 生态; 天人和谐; 黄老道家

中图分类号: B226.1; B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3)04-0139-08

在中国思想史上,《管子》与《淮南子》,一则是战国时期齐文化的历史代表,另一则是秦汉时期楚文化的时代典型,都可谓"千古奇书"。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彰显出不同的地域特色,但作为"对先秦文化的总结"的"综合家著作"[1],二者在思想上并非互不影响,而是存在密切的历史联系,这在农业生态观上就有着突出反映。《管子》的农业思想不仅主张"农为国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天、地、人和谐的农业生态观,深刻认识到人类农业实践的内在的局限性,试图通过统治者制定合理的农业政策,从而有效推动和促进现实的农业发展顺应自然规律,实现良性发展。对《管子》的这种可贵思想,《淮南子》在西汉前期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氛围中,立足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进行了积极而深入地历史继承和融会,形成秦汉时期独具特色的农业生态观。因此,从《管子》到《淮南子》,传统农业生态观不仅获得连续性发展,而且实现历史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从中充分体现出二者对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重要贡献。

一、农为国本——《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的理论前提

作为先秦时期齐国"稷下学术中的一部论文总集"[2],《管子》农业思想丰富,且卓有见识。"农为国本",这既是《管子》论农的思想基础,也是其从自然生态视角反思人类农业实践的理论前提。正因为《管子》认为"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侈靡》)[3],"地者,政之本也,"(《乘马》)"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牧民》),始终将农业生产与发展视为统治者的首要政务,所以才能进而从农业自身出发,强调利用各种现实条件,推动农业活动合乎自然规律的开展,从而取得良好结果。《管子》的这种农业认识,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深为契合,后者也同样是在坚持和强调农业"以为天下先"(《齐俗训》)[4],"食者,民之本也"(《主术训》)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因天地之自然"(《原道训》)以治农,实现农业活动的生态化发展。基于这种共识,《管子》与《淮南子》在阐发各自农业思想的过程中,都对农业生产的政治性给予高度关注和论述。

收稿日期:2011-11-25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1sk142);安徽省社科联项目(B2012001)

作者简介:高 旭(1979—),男,陕西延安人,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

首先，《管子》与《淮南子》都重视农业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凸显其中“农为国本”的政治内涵。在《管子》看来，国家有贫富、强弱之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的农业发展，“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八观》）因此统治者只有积极发展农业，才能实现“桑麻殖于野，五穀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立政》）。对统治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权修》）“地辟举，则民留处，”（《牧民》）“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揆度》）只有农业经济良好发展，“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统治者才能真正夯实政治基础，稳定政治秩序。否则，必然造成民怨国贫、人不为用的政治窘境，直至亡国灭身。从这种认识出发，《管子》在思想上认为“务本饬末则富”（《幼官》），强调农业生产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重要性，认为“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事语》），“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权修》）既将农业生产视为统治者的首要政务，更将其看作国家政治的根本基础。与《管子》相同，《淮南子》也认为“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在现实政治发展中，民众如若想避免“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本经训》）的生存窘境，就必须“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主术训》），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各种农业经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明确在思想上提出“食者，民之本也”的基本观点，将农业发展视为民众生存、国家富强的首要基础，由此同《管子》在“农为国本”的政治认识上形成历史的内在契合。

其次，《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农业发展应以民众为主体，体现统治者的促农实践，彰显其中“民为农本”的政治内涵。一方面，《管子》认为民众应成为积极力农的生产主体，“非诚农不得食于农，”（《乘马》）“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轻重己》）因为民众的生存所需只能基于现实农业的稳定发展，而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只有“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才能实现民众“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如若相反，“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那只能是民众“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五辅》）。由此，《管子》指出，民众生存利益的有效保障，根本上仍在于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就成为国家现实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五辅》），始终坚持以农为本、积极力农，才能满足自我所需。另一方面，《管子》强调统治者应导民务农，有效推动农业生产，认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而民富的关键则在于“实圹虚，垦田畴，修墙屋”（《五辅》）。因此，统治者必须坚持农本政策，在现实中“畜长树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将此作为“民之经产也”（《重令》），在“农夫不失其时”，“民无游日”中促进农业发展，实现“财无砥墆”（《法法》），民富国强。对《管子》“民为农本”的思想认识，《淮南子》所持看法相近，也认为“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主术训》），而“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因此只有促民力农为先，才能“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齐俗训》）。

最后，《管子》与《淮南子》都强调农业生产对君、民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影响，成为王朝政治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体现出强烈的“民为君本”的政治内涵。《管子》在政治上始终强调“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主张“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视为王朝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础。《管子》认为“人之守在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因为“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权修》），如若统治者缺少基本的农业经济条件，无法满足民众生存所需，则必然会造成君、民矛盾，以至于君民对立、民叛其君。所以，《管子》明确提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主张统治者在实践中要深明“粟

也者,民之所归也”,“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治国》)的政理,能真正做到“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轻重甲》),让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基于这种“富民”为要的政治认识,《管子》既要求统治者坚持“重农抑末”政策,促使民众勤于耕织,“利出一孔”,又要求统治者必须寡欲节俭,反对“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正世》),认为“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出国轨》),“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权修》)在农业生产对君、民关系的特殊影响上,《淮南子》的政治认识与《管子》所见略同。《淮南子》对秦汉时期统治者因破坏农业生产而导致王朝衰亡的历史教训,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审思,因此在思想上严厉批判“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的政治发展,强烈谴责“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主术训》)的暴虐之君,始终坚持“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的政治理念。由此而言,以民为本、促君善治,这成为《管子》与《淮南子》的政治共识,深刻影响二者的农业思想。

总之,从思想上看,《管子》与《淮南子》论农实际上都体现出一定的双重性:一是从政治视野出发,坚持“重农”理念,认为现实的农业发展应体现出“农为国本”、“民为农本”和“民为君本”的政治内涵,充分发挥出农业经济在王朝政治中所具有的基础作用,进而构建合理的君、民关系,促使现实政治体现出内在的民本性,从而根本上实现专制君主政治的长治久安;二是从农业的客观规律出发,注重农业生产的自然性、生态性要求,力求推动现实农业走向合理发展。应该说,对农业发展的政治内涵的强调,成为二者之所以更为重视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现实动力,也成为其深入反思农业优化发展途径的理论前提。作为先驱者的《管子》,以其深厚的“农本”思想熏染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者秉持黄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农业生产,强调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渊源之一。

二、天人和谐——《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的核心内涵

正是基于农业发展在现实社会政治中的重要性,对农业生产如何才能实现良好发展的重要问题,《管子》与《淮南子》都立足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反思,试图由此形成各自关于理想农业的思想认识,这在二者的农业生态观上表现突出。《管子》在农业发展上注重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主张农业生产中应“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认为“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强调天、地、人这三种基本因素在现实农业中应实现一定的整体性、协调性,由此初步形成一种以“天人和谐”为核心思想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在《管子》看来,一切的农业生产活动都必须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这种生态发展意识,实现天时、地利与人力的有机结合,只有“顺天之时,得地之宜,中人之和”,才能取得“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禁藏》)的良好结果。历史地看,《管子》这种农业生态观具有前驱性,早于《淮南子》,对后者所主张“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主术训》)的思想认识有着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其历史的承继与发展。

(一)《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顺天之时”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而且强调统治者应从国家政治的视野出发,对农业生产进行时序化的统筹发展

《管子》认为“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禁藏》),“耕褥者有时,”(《治国》)“不务天时,则财不生,”(《牧民》)“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法法》)将能否有效掌握自然的农时规律,合理安排农业耕作看作是实际农业生产的必要前提。因此,《管子》坚决反对“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权修》)的消极发展,认为统治者只有始终践行“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的基本原则,才能使“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立政》)。基于此,《管子》进而强调“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主张“以时为宝,以政为仪”(《白心》),“圣

王务时而寄政焉”(《四时》),认为农业生产应合理统筹,实现时序化发展,“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与国家的政治发展相适应。对《管子》所言“顺天之时”,《淮南子》深有认同,也认为农业生产必须能“上因天时”(《要略》),“制度阴阳”(《时则训》),只有如此才能“因天地之自然”,使得“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而且强调“因天时”应与“地利”、“人则”相协调配合,“以为法式”,实现农业生产“终而复始,转于无极”的良好发展。

(二)《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得地之宜”是农业生产得到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都极为重视农业劳动者对土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把握,强调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利优势

《管子》认为“地生万财,以养万物”(《形势解》),“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牧民》)对民众而言,对所耕土地的实际情况了解与否,这直接影响到最终劳动成果的获得,“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权修》)因此,《管子》在政治上要求统治者能从国家发展的立场出发,能有效推动农业生产中“地利”因素的发挥,“发地利,足财用也”(《君臣》),甚至认为“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立政》),直接将“地利”问题与统治者的政治发展相关联。基于这种认识,《管子》对农作物的土壤条件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地员》),主张农业劳动者应在实践中“别群轨,相壤宜”(《山国轨》),“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立政》)与此相同,《淮南子》也强调农业生产应以“地为准”,认为“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时则训》),只有充分利用实际的土壤条件,才能“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诠言训》)。

(三)《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中人之和”是农业生产实现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明确强调统治者在现实中应确保农业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条件,不因虐政而乱农祸民

《管子》认为农业生产的实际发展,虽然仰赖于“天时”、“地利”,但根本上仍须“中度之人顺”(《五辅》),因为“善因天时,辨于地利”,都离不开“人和”,都需要农业劳动者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才能有效的综合与运用。正因为如此,《管子》主张“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也”(《小问》),将农业劳动者在在时、地上所应发挥的主体性凸显出来。“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耨、茇,及寒,击槀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遫,首戴苧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小匡》)从中可见,在《管子》看来,“耕者农,农用力,”(《大匡》)“非诚农不得食于农,”(《乘马》)农业生产只有积极发挥“人和”,彰显出劳动者“力以疾从事于田野”的能动作用,才能五谷蕃殖,获得丰收。对统治者而言,《管子》认为若要仓廪丰实、国家富强,则必须能“处农必就田墅”(《小匡》),使其“力农垦草,禁止末事”(《重令》)。《淮南子》在农业思想上也持类似看法,强调“中用人力”,将“举力农”(《时则训》),“以为百姓力农,”(《主术训》)“农无遗力”(《缪称训》)视为现实农业生产的主体因素,认为统治者只有确保“农不离野,”(《兵略训》)“农无废功,”(《齐俗训》)才能合用时、地,促农发展。

(四)《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天、地、人三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协调运用,这是推动农业生产获得生态化发展,实现“天人和谐”的农业理想的必由之路

《管子》所言“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的“三度”农业生态观,虽然在先秦时期并非独创之见,但却是先秦农业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组成,作为齐文化的代表性论著,在相当程度上深刻反映出东方国家具有的农业生态意识,而其中所彰显“天人和谐”的核心理念也是秦汉时期传统农业发展的主流思想,成为日后《淮南子》得以借鉴和承继的历史资源。在《管子》看来,人类的农业生产并非单向度的劳动实践,而是需要充分考量各种自然生态条件,不论是天时,抑或地利,都需合乎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应取之有度,而非竭泽而渔。因此,《管子》一方面主张“重农”、力农,强调人类应合乎规律地发挥主体作用,开发自然资源,推动农、林、牧、渔等多种农业经

济协调发展,从而解决民众的生存所需,实现国家富强;但另一方,《管子》也明确认为,人类的农业活动应该坚持“禁发必有时”(《八观》),“以时禁发焉”(《立政》)的基本原则,甚至统治者还应设立专门职官来确保“四禁”政策的贯彻实施,防止农业生产走向过度消耗、破坏生态的歧途。应该说,《管子》这种“三度”农业生态观,对《淮南子》有着显著影响。《淮南子》在农业发展上始终强调“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修务训》)认为统治者应该“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统筹农业经济的现实发展,促使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相协调,“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泰族训》)“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主术训》)《淮南子》认为,这种“因天地之自然”(《原道训》),“因资而立功”(《氾论训》)的农业发展,有利于人类劳动与自然生态相融合,最终能“以为民资”(《主术训》),根本上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农业理想。

总之,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论著,《管子》农业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其强调天、地、人相和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堪为战国时期农业思想史的奇葩,对西汉前期产生的《淮南子》影响深远。正是基于对“管子之书”的政治敬意和深刻认识,《淮南子》充分承继前者的农业生态思想,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立足于黄老道家,进行历史的融会和发展。

三、黄老本位——《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的思想差异

历史的看,《管子》与《淮南子》皆可谓“杂家”,都“具有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5],理论构成复杂。若就农业生态观而言,二者多元思想的基础上存在着重要差异,其中尤以黄老道家为关键。在《管子》中,虽然黄老道家也有着突出反映,但更为集中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如为君之道、君臣关系等,显著反映出君主南面之术的思想内涵。相反,在农业生态观上,与《淮南子》相较,要远为逊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否以黄老道家为本位,这成为《管子》与《淮南子》在农业生态观上的分水岭,对二者的农业思想具有根本影响。

其一,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之“自然”的重视程度不同。《管子》虽然在农业思想上注重天、地、人相和谐,但其对黄老道家之“自然”却较少提及,这与《淮南子》形成鲜明对比。“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形势》)这里的“自然”对《管子》而言,主要侧重于统治者“王天下”的政治实践,而非专论农业生产。同《管子》迥异,“自然”在《淮南子》中具有显著影响,成为其农业生态观最为重要的标志词。《淮南子》对现实的农业发展始终持有“因其自然而推之”,“因天地之自然,”“万物固以自然”(《原道训》)的基本理念,将自然以治农看作为实现天人和谐的农业理想的根本途径。正是这种强调“法自然”的思想认识,使得《淮南子》农业生态观发散出极为浓厚的黄老道家气息,对其天、地、人相和谐的农业思想起到决定作用,也使得《淮南子》能彰显出《管子》所缺少的秦汉时代特性。

其二,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之“无为”的思想认识有别。

《管子》在思想上也讲“事无为也,无所生”(《君臣》),“君子不休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心术上》)“无为者帝,”(《势》),但这种“无为”与统治者的政治治术密切相关,对农业生态观却较少起到应有的理论作用,换言之,《管子》之“无为”重在政治,而非农业。《淮南子》之“无为”则不然,不仅体现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上,而且注重与“自然”相结合,在农业生态观上反映突出。《淮南子》认为“究于物者,终于无为”,“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原道训》)“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

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主术训》)"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诠言训》)从中可见,"无为"对《淮南子》而言,在农业生产上更能彰显出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黄老国策,而这正是其所处特定时代深刻影响的历史结果。

其三,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之"因"的使用程度不同。"因"是先秦以来道家的重要概念,常用以体现"道法自然"的哲学内涵,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庄子·德充符》)[6],"因于物而不去,"(《庄子·在宥》)"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庄子·秋水》)在《管子》农业思想上,"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如"因天材,就地利"(《乘马》),"取与之必因于时也,"(《宙合》)但不及《淮南子》使用的频繁和深入。《淮南子》将"因"与"自然"密切结合,"因其自然而推之,""因天地之自然,""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原道训》)"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主术训》)"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修务训》)"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诠言训》)"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泰族训》)由此既凸显出人类农业实践对自然资源所应有的积极利用,也在其农业生态观上彰显出道家"法自然"思想。

其四,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并非如《淮南子》那样对黄老道家持本位立场,而只是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相反,《管子》受齐法家的深刻影响[7],在其农业思想上也表现出一定的法家气息,而且对持"重商"立场的轻重家思想也十分重视,这为《淮南子》所罕见。《管子》在政治上也如法家那样"尊君"为务,强调"利出一孔",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统治者应"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将农业经济作为一种"牧民"的统治手段来运用。而且,《管子》虽然强调"农本"理念,但其并不排斥"重商"思想,反而在农业发展上有所重视。在《管子》看来,统治者在政治上应坚持"君养其本谨也",让民众"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镶粮食,毕取赡于君",达到农业经济上"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国蓄》)的根本目的,以此牢固控制广大民众。由此,《管子》主张"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巨乘马》),"民富不如民贫,"(《山权数》)认为统治者对民众在农业经济上的贫富应有所掌控。应该说,《管子》这种农业思想认识,在《淮南子》没有得到历史回应。反之,《淮南子》基于秦汉之际的历史教训,对"尊君"的极端化发展较为警醒,始终对民众与农业生产曾遭受过的政治破坏感受痛切,因此在农业发展上,《淮南子》较《管子》更能彰显食为民本、民为国本的政治精神,从而对农业的生态化发展更为关注,而非过度强调农业经济作为政治手段后的现实运用。

总之,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思想都有深刻反映,但二者思想体系中,黄老道家的理论地位则表现有异。《淮南子》始终以黄老思想为本位,形成整体化的道家农业生态观;与之相比,黄老思想在《管子》中并非本位,法家、轻重家对其农业思想也有显著影响,因此《管子》农业生态观的道家化程度要逊色于前者。

四、承继融会——《淮南子》对《管子》农业生态观的历史发展

虽然《管子》与《淮南子》产生的时代条件和文化环境不同,但从思想而言,《管子》对汉初清净无为的政治环境中的《淮南子》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得到后者多方面的汲取[8],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而且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上也反映突出。正如《淮南子》所言"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要略》),基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作为齐文化的代表,《管子》在农业思想上总结和累积丰富的耕作经验,形成独到的"三度"农业生态观。这种充满天人和谐意识的农业理念,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消泯,相反,历经秦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后,作为可贵的思想资源,在"汉代初年学术融合的一个缩影"[9]的《淮南子》中得到承继与融会,并以新的理论形态展现出来。

从黄老立场出发,《淮南子》承继《管子》对农业生产之“道”的重视,更为凸显“体道”思想,追求农业生态的理想发展。

《管子》认为“道生天地”(《四时》),在政治上主张“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形势》),要求统治者应深明农业发展之“道”,因为“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对此,《淮南子》在思想上不仅认同和承继,而且有所深化和发展。《淮南子》坚持黄老思想,认为“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将“道”视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强调“欲知天道,察其数;欲知地道,物其树”(《缪称训》),认为农业发展应遵循生态规律,只有“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原道训》),才能“农乐其业”,“六合不足均也。”因此,《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执道要之柄”,只有“通于天道”,如“神农之治天下也”,才能“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在理想的生态环境中实现“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主术训》)的农业发展。

立足黄老思想,《淮南子》承继《管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更为彰显“自然”思想,力求天人和谐的农业发展。

如前所述,《管子》重视农业生态,但较少言及“自然”,《淮南子》则相反,始终将“自然”作为农业生态发展的核心意蕴。在《淮南子》看来,“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草木荣华,秋风下霜,到生挫伤”,因此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应掌握其自然规律,力求做到“并得其宜,物便其所”(《原道训》)。由此,《淮南子》在农业思想上一方面反复强调“万物因之自然”,“因其自然而推之,”认为“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览冥训)将合乎农作物生态本性的“自然”发展视为农业理想;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农业劳动“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认为“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 其势不可也”(《主术训》)。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对天、地、人关系的历史思考更加黄老化,也更能彰显秦汉道家所独有的生态理念及精神。

坚持黄老本位,《淮南子》承继《管子》的农业生态保护思想,注重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更为体现“无为”思想,探求理性发展的农业之路。

《管子》在农业上注重对农、林、牧、渔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既主张统治者应“禁发必有时”(《八观》),“山林梁泽,以时禁发,”(《戒》)也强调统治者还应“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君臣》),从而协调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关系,推动农业的生态化发展。对《管子》这种农业生态观,《淮南子》深为认同,且以黄老道家之“无为”思想进行融会和发展。《淮南子》认为“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任何农业活动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与其“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莫如“因之也”(《原道训》)。因此,《淮南子》在思想上极力主张“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原道训》)。基于这种认识,在《淮南子》看来,人类的农业生产应遵循“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主术训》)的原则,内在协调天、地、人关系,使其成为“不可偏废”的“有机统一体”[10],促使农业劳动在适应自然生态中展开。由此,《淮南子》与《管子》同样重视农业生态的保护,主张一年之中应“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同时认为也明确要求统治者清净寡欲,“毋作大事,以妨农功”,“毋兴土功,毋伐大树,”而应“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毋令害谷”,“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时则训》)积极推动农业的生态化发展。应该说,《淮南子》之所以在农业发展上强调“无为而治”(《诠言训》)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秦汉之际的农业教训,正是由于统治者“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经常“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主术训》),致使农业生产在政治动荡中难以有序进行,而农业生态的理性发展最终也无法实现。因此,与《管子》相较,虽然《淮南子》在政治上也主张务实治国,但并非法家式的“有为”,而是认为“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说山训》),试图以黄老式的“无为”来达到“无所不为”,促使统治者能清净自守,不因欲而害农祸民。

综上所述,作为齐文化的巨著,《管子》农业思想是先秦农学史的重要组成,而其基于"重农"理念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对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影响深远,这在汉初《淮南子》中即有突出反映。由于作者中就有来自齐地的学者,所以《淮南子》受到齐文化的直接熏染[11],认为"管子之书"历史地总结桓公之时"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要略》)的政治经验,深可为取法。也正由此,对《管子》的农业思想,尤其是独到的农业生态观,《淮南子》从王朝政治发展的高度着眼,立足黄老道家,有所历史承继,并进而融会其他的思想因素,形成颇具秦汉时代特色的天、地、人一体化的农业生态观[12]。当然,对《淮南子》而言,除《管子》外,其农业思想所受《吕氏春秋》与先秦农家著作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但毋庸置疑,《管子》是《淮南子》农业生态观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石之一。

参考文献:

[1] 牟钟鉴.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1987:279-280.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99.
[3]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何 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张固也.《管子》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6:400.
[6]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7]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82:47.
[8] 耿振东.《管子》研究史(战国至宋代)[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29.
[9] 马庆洲. 淮南子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7.
[10] 陈广忠. 淮南子科技思想[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224.
[11] 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J]. 管子学刊,2012,(4):19-23.
[12] 王巧慧. 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338-352.

A Comparis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View Between Guanzi and Huainanzi

GAO Xu[1,2]

(1. *Culture Institute of ChuHuai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2. *History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232001, *China*)

Abstract: Guanzi and Huainanzi involve rich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thought, and there is an intrinsic historical link between them. Both emphasize on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dhere to the agriculture-oriented concept; On this basis, the agricultural theory highlight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of human and nature.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uma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both are against excessive interference and impact on the natural ecology. Compared with Huainanzi, there is less ecological influence of Taoism and more influence of business in Guanzi, However,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former, as that is its important resources of inheriting and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ec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 guanzi; huainanzi; concept of agriculture; ecology;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aoism